

# 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梅 然

〔内容提要〕 核威慑在当今国际安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认为,鉴于冷战后西方和非西方对抗的规模、西方的常规力量优势、常规空中打击以外的其他常规方式的可选择性,表达威慑信息方式上的问题,以及随便使用核武器而来的道义和政治代价、遭到报复的危险、增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等因素,西方国家的非报复性威胁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虽然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将放弃核武器。

〔关键词〕 核威慑 国际安全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邮编:100871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显然,军事领域的因素及其变革不可避免地会深刻影响国家间的政治生活。这也是西方国际政治学者们的一个传统研究重点所在,他们关注军事技术、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进攻和防御、军事战略和战略文化、军事组织、军民关系等等因素对于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不少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比如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相对效用、战略文化、军方的组织利益等对对外冲突、威慑以及核战略的影响的种种理论。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现实,在重视“宏观大理论”(无论是关于传统的“时代”和“格局”问题,还是关于源自西方的各种“范式”问题及在此统辖下的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文明冲突、全球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和以传统的方式来研讨各种“关系”问题及地区问题的同时,军事力量及其变革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联也应更多地为我国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

迄今,没有一种武器象核武器这样紧密地和国际政治联系到了一起。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在核国家之间,避免战争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冷战时代两极之间“热战”的得以避免也被普遍地归结于它们各自拥有的庞大核武库。总之,核武器被广泛认为对于国家间的政治斗争具有下述威慑意义上的作用:一个核国家的核武器可以迫使其对手约束其行为,从而降低国家间军事冲突的频度或强度。即便在军事意义上,“威慑”也被认为是核武器的基本功能。不过,冷战的历史也明显暴露了核威慑作用的局限。

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核大战的危险也已散去。可是,核武器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核国家似乎还有增加之势。那么,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局势背景下,一国的核威慑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他国的行为?或者说,核威慑将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

关于对此的实证研究,参见:Richard Ned Lebow & Janice Gross Stein, *W e A 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4 关于核武器对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稳定”作用,有人对现有的主要观点作出了简述。见 James J. W irtz, “Beyond Bipolarity: Prospects for Nuclear Stability after the Cold War.” in T. V. Paul, Richard J. Harknett & James J. W irtz, eds., *The Absolute Weakness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98 pp. 138—140

本文要探讨的是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核威慑是指非报复性威胁使用核武器(也可以说是首先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这样的说明并未限制论题的价值,因为在首先遭到核打击的情形下进行核报复通常被视作当然之举。而且,所有的核国家总是希望,除了防止其他核国家对自己动用核武器,自己手中的核武器还能具有更广泛的威慑作用。实际上,平时人们谈及的“核威慑”首先就是非报复性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

如今,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此相关它们也拥有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另一方面,似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对抗的主题,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总是不时存在着。而且,在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中,也有着西方核国家。因此,研究当前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就该问题的研究状况而言,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军队部门的一些人士涉及到了这一方面,但也未提供系统的阐述。在国外,论述核威慑的著述远比论述核扩散的要少,而且,本人从中尚未看到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深入探讨冷战后西方世界核威慑的作用的研究成果。

今天,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已无现实的可能。相应地,冷战后西方国家只可能与非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对抗。因此,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是在这种框架中加以考察的。由于“可信性”是决定威慑的作用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主要是从“可信性”的角度来论证上题。

## 有限的对抗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谋求建立一个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领导者的全球秩序。与此相应,对非西方地区事务的积极干涉成为了西方国家对外行为的一项基本内容,而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威胁使用也成为了西方的一个政策手段。根据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或打击的对象是“桀骜不驯”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传统上属于第三世界的这类非西方国家。西方的具体理由主要是:1. 它们从事或支持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目标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2. 它们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公民或少数民族权利”的行为;3. 它们“侵犯”了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西

---

比如,我国防大学有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目前美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的数量和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对使用核武器的牵制增大,核武器在美国军事力量中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具有基石和核心的作用”。见王仲春、夏春平著,《美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137页。

一些著述能够提供若干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两本著作值得一提,它们是:Keith B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Lexington, 1997; T. V. Paul, Richard J. Harknett & James J. Wirtz, eds., *The Absolute Weapon Revisited: Nuclear Arm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98。但是,前者主要论述的是,在冷战后的新环境中,美国如何利用核威慑来遏止敌对的非西方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后者涉及的主题相对广泛,但并未对本文所针对的问题有专门的分析,且也没有和冷战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具体现实紧密结合。

关于美国学者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探讨和相关的官方文件,见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MIT Press, Cambridge, 1997。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曾指出当前美国可能动用武力的七种情形。见Michael P. Noonan, “The Illusion of Bloodless Victories,” *Orbis*, 41, Spring 1997. p. 312

方世界眼中的这些行为都远未在直接的意义上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生死存亡。即便一个非西方国家侵占了另一个国家,也很难想象这个“牺牲品”是西方国家。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中,这种占领将只是对某国领土的部分占领。即便是完全的吞并,它也远不是西方国家需要倾其全力加以对付的。因此,一个非西方国家对另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军事行为最多只是损害了西方重要的而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

因此,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每一个上述形式的“威胁”都是有限的。实际上,当强大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的行为作出军事反应时,是后者而非前者有更多的受威胁感、紧张乃至恐慌。如果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安全的挑战遍布了全球,考虑到对于某个安全威胁的回应方式将切实地影响到其他的安全威胁的强度,对于某个或每一个具体的安全挑战,西方国家也许会采取“过度反应”策略,以求显示自己的决心,使每一个挑战者都意识到,和西方作对将招致比想象的要更加严厉的回击。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在非西方国家中,和西方处于对峙或对抗之中的只是极少数,西方集团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使一些原本和它们对立的非西方国家也对之采取了稳健政策,包括伊朗和利比亚。绝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基本上持有亲西方的倾向,和西方也保持着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席卷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浪潮也远未出现。这样,西方国家并无必要对若干处于其对立面的非西方国家的行为作出像使用核武器这样的过于强烈的回应,这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在冷战后时代,无论是从单个的还是总体的强度来说,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挑战”都是有限的。不过,也需要认识到,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发出了威慑或发起了打击,那它被牵扯进这场对抗的利益不仅仅包括那些成为冲突所在的内容,还包括和这些威慑或打击行为的结果相联系的政治利益。比如说,国家的政治威望。如果一国的威慑不为对方理睬,而它又没有履行威慑,它的威望可能受到削弱,它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可能受损。如果一国言出必行,它自然捍卫了自己的威望。可是,如果为履行威慑而进行的军事打击也不能令对手屈服,威望问题还可能存在。为此,一国或许会硬着头皮把战争打下去,以求最终使对手认输。在同样的意义上,作出威慑或打击决定的领导人的政治生命也多少维系在其决定所导致的结果上。

这样一来,一场国际对抗不免有着和一国所牵涉进去的利益并不相称的升级危险,在科索沃危机中,北约和美国之所以旷日持久地对南斯拉夫进行猛烈轰炸,并且同时考虑地面进攻计划,也是因为和这场危机的结局相连的北约、美国及其领导人的声誉问题令其难以蒙羞而退。那么,假如常规的军事打击不能使某个本来只有限地威胁到西方利益的非西方国家屈服,为了上述的政治利益,西方国家是否会动用核武器?核威慑是否因此而具有明显的作用?这里的看法是,这种利益虽然重要,但也远非生死攸关。所谓的国家威望的作用往往显得虚幻,而西方领导人的政治声望更只是一项个人利益所在。乔纳森·莫瑟尔的经验研究认为,在对抗中,为给自己挣得一个有决心和魄力的名声而和对手打仗没什么必要。在将来的对抗中,这种名声对于对手的心理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即使作一次退让也许被认为对国家的威望或领导人的国内地位有重要的消极影响,但很可能仍有更为重要的利益令人难以割舍这种选择。所以,古巴危机中的赫鲁晓夫最后屈从了美国的压力,而死了几个美国兵就令白宫对艾德德由缉拿改为了安抚。当初北约对南斯拉夫揪着不放,那是因为它自觉还没有到

非要找机会下台甚至红着脸认输的时候。而且,对北约来说,如果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转而实行全面的制裁,它的所谓“威信”难道就一定比以前下降了?它对南斯拉夫的长达几个星期的猛烈空袭即便没有让贝尔格莱德屈服,在日后也不能不令有关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强硬的炮舰政策有所顾虑。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现实中,有什么威望是如此不可舍弃,以至于值得为之去承受使用核武器的严重而又不可预测的道义、政治和军事后果?况且,如果某个国家或领导人使用了核武器,难道这对其威望和地位就没有相反的作用?

因此,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具体对抗(无论它是处于军事冲突阶段还是危机阶段)中,所牵涉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对西方国家而言,对抗是有限的。所谓“有限”,指的是一场对抗所涉及的西方利益的大小使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得不偿失,这决定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核威慑的作用的限度。这里的“得不偿失”不仅和使用核武器的消极后果本身,比如核武器的使用促进了核扩散;也和对抗中牵涉的利益的大小直接有关,比如为不那么重要的利益而使用核武器会招致更大的道义责难。这些也是下文将进一步分析的。

## 核打击的破坏性

通常,核武器的使用会令人想到整个城市成为废墟以及成千上万的生灵遭到灭绝。在当前的对抗中,假如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动用核武器,所打击的对象将是军事和工业目标为主的非平民目标,而且会尽量是那些不位于城市的目标,因为核爆炸的冲击波和释放的放射性核尘埃对平民仍然可能具有严重的“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在自海湾战争以来的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常规空中打击完全针对的是军事和工业等非平民目标。西方国家这样做的一个基本考虑是,对平民聚居区的轰炸所造成的巨大平民伤亡会造成巨大的道义问题,进而给自己带来不少政治上的困难。在不少西方人士看来,之所以基于道义问题应该避免平民的重大伤亡,在于他们不是非西方国家的那些应予“惩罚”的行为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对于本国政权也不能发挥实质性影响。如一篇《外交》季刊上的文章所说,用核武器来彻底摧毁伊拉克或北朝鲜的平民聚居中心是极不正义的。“不管是伊拉克还是北朝鲜的平民对于他们的政府都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苏联的居民也是如此。……一项单方面确保摧毁的政策不仅对美国没有价值,而且也超出了美国公众的良心能心安理得地把持住的界限。它将在所针对的目标及处于其下风的邻国引发如此不成比例的复仇心理,以至于这种战略几乎没有可信的威慑力。”另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理由是,在“专制”的非西方国家中,统治者并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和福祉放在心上,他们所重视的是那些对于他们掌握政权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比如军队和警察系统等等。同此,应该将这些作为军事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在美苏对抗年代就已存在的观念。如今,同样的逻辑又被运用在了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身上。

精确轰炸技术使西方国家能够实现对打击目标的选择性。而且,用核武器打击居民区的

---

有美国学者认为,西方对非西方威胁的性质是夸大的。见 John Mueller, "The Catastrophe Quota: Trouble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8, September 1994

Seth Cropsey, "The Only Credible Threa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作法等于为日后他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树立了危险的先例。也不会有人相信，西方国家敢于发疯地动用上十枚核弹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即使所针对的都是军事和工业目标。这必然导致一场数以万计的平民被“连带”杀死（比如由于核尘埃）的空前的人道主义惨祸，当然也会造成巨大的生态悲剧。而且这类结果很可能是跨国界的。这样做的唯一技术理由只能是，借助大范围轰炸来预先摧毁对手的核报复能力，假如对手是一个核国家的话。可是，撇开如此行事的其他各种严重后果不谈，单是这个目标也不能有把握实现。

有关的非西方国家所预期的西方核打击的破坏性的相对有限可能降低西方核威慑的约束力。如今，西方存在着关于微型核武器的讨论。这种核武器杀伤力的相对较小似乎使其变得“可用”。可是，破坏力的有限难道不会损害威慑的作用？这种结果还可能由于下面的情形而得以强化：核武器毕竟是核武器，在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过去几十年之后，对核武器的十分有限但却是首次的使用必然会在全球引起后果无法预料的轩然大波。这样，鉴于对抗所牵扯的实际利益，西方国家的核威慑自然又遇到了作用上的严重问题。

## 基于空中打击能力的常规威慑

对西方的核威慑的作用的一个强有力挑战是西方拥有的常规威慑能力。基于高技术能力，如今西方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具有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明显优势。西方的常规空中打击能力的强大尤为突出。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西方国家而言，在和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自己优越的常规空中打击能力可以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一个有力手段。精确制导的常规炸弹和导弹可以准确地击中有关目标。具有穿透力的弹头还可以对一些地下“硬目标”进行打击，摧毁地下指挥所、军火仓库或其他军事设施。因此，常规空中打击能够给对手造成严重乃至难以接受的损失。而且，空中打击的准确意味着更少的平民伤亡，这自然有利于减轻平民的伤亡所引起的道义问题。对照于多国部队空袭的猛烈，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所遭受的平民伤亡应该说明是小的。当时在巴格达的一位和平活动家提到，灵巧炸弹没有“造成可使和平运动发动起来的那种图景。”

奉行空中打击战略还可以使西方国家大大地降低己方战斗人员的伤亡和物质损耗，从而减少国内对卷入军事冲突的抵触情绪。首先，空中打击的效力意味着不必或至少暂时不必投入大量地面部队进行地面作战，而进行地面战争不仅可能带来相当的人员伤亡，还要求得到比单纯的空中打击要大得多的财政支持。其次，空中打击的长距离可能意味着，起飞或发射基地可以处于敌方的反击之外。再者，空中打击的准确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出击架次和更少的弹药来取得同样的战果，从而可以明显降低物资和飞行人员方面的损耗。

所以，在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常规威慑。除了上述自身的优点，相比于核威慑，这种威慑还有其长处。一旦威慑失败，履行它不可能像履行核威慑那样容易引发不少严重问题，比如道义问题和遭到核报复的危险。所以，在冷战后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西方国家大可以常规空中打击相威胁，进行常规威慑。

Thomas W. Dowler, Joseph S. Howard II, "Stability in a Proliferated World," *Strategic Review*, 23, Spring 1995, p. 32

R. A. Mason, "The Air War in the Gulf," *Survival*, 33, Mar/June 1991, p. 225

Jeffrey Record, *Hollow Victory*, Brassey's, Mclean, 1993, p. 112

在西方国家,这也是普遍的看法。比如,塞思·克罗普塞主张用常规巡航导弹来遏止对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

在实践中,以常规空中打击为主的武力威胁或武力打击也已经成为美国对付“不友好”的非西方国家的流行政策。与此相关,相对于基于常规空中打击的威慑,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可信性会进一步淡化。这种变化是最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的一个结果。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军事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常规武器正在赢回被核武器所夺去的使用空间。前苏联的战略家和军人是第一个认识到了这种变化。苏联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曾声称,技术突破将赋予常规武器一种在过去只能是梦想的精确性,从而使其在战斗中具有一种可与战术核武器媲美的效能。今天,“许多分析家和战略思想家相信,军事革命正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发生。主要的特点就是常规武器在为冷战期间核武器增加的阴影笼罩了五十年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冷战时代美国在核战略领域的头面人物保罗·尼采也认为,精确而有威力的常规武器使核武器不再那么为人需要,而且,由于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技术优势,禁止核武器只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一种威慑手段是否具有可信性,不仅取决于就其本身而言,当事者是否具有实施这种威慑的能力和意愿,还要看在此之外,他是否具有更好的威慑手段。在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西方国家实行以空中打击为主的常规威慑的能力将严重损害核威慑的可信性。当然,在目前,常规力量并不能完全取代核力量的威慑地位,尤其是在战略威慑方面。但是,常规力量效能的强大毕竟给西方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手段。假如用常规武器就可以有效地打击敌方,而又不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使用核武器呢?

## 空中打击失败之后的选择

应该承认,基于常规空中打击的威慑不一定能使对手退让,而发起这种打击最终也未必令其屈服。罗伯特·帕普通过经验研究认为,二战期间盟国对德国和日本、朝鲜战争中美国对北朝鲜、越战中美国对北越和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空袭都未产生多少积极效果,反而令对手更不愿意屈服。可是,即便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常规空中打击不能带来所期望的政治成果,西方核威慑的作用依然十分纤弱。在科索沃危机中,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北约绵延不绝的空中打击没有让南斯拉夫屈服,但西方国家并未发出核威胁。与此同时,它们倒是不断地表露出选择地面进攻的倾向。和核打击相比,地面进攻远为费钱且容易带来己方战斗人员的重大伤亡。但是,它的成功就意味着对手的最终失败。重要的是,它没有伴随着核打击而来的那么多令人把握不定的副作用,后者令地面战可能造成的士兵伤亡的重大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风险也相形见绌。而且,核弹投掷出去就收不回来,而地面进攻则没有排除灵活

Cropsey, "The Only Credible Threat"

Ahmed S. Hashim,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Outside the We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1, Spring 1998, p. 433

转引自 John Baylis, "The Future of Nuclear Weapons: Balancing Power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II, August 1997, p. 6

Roert A. Pape,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Ithaca, 1996

性。在进攻的同时或进攻受挫之际,还可以考虑其他旨在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为此,如果长期的空中常规打击没有结果,而西方国家又不甘心放弃或丢失脸面,它们更可能选择地面行动。

假如地面战争也达不到目的,而其他举措也无力改变局面,西方国家还是不可能使用核武器。根本的原因是,在冷战后时代的有限冲突中,对西方国家来说,动用核武器可能导致的各种消极后果要超出所能带来的好处,包括“威望”、“声誉”这些精神价值。何况,核攻击能取得多大的成果也是疑问。面对僵局,合格的政治家也许还很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过得去的解决办法;实在不行,就只能红着脸抽身而退了。当年,美国既对越南北方大肆空袭,又向南越派遣了大量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可最后,筋疲力尽的它还是不得不选择了放弃南越的做法。在美国卷入越战期间,它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捍卫美国在抵御全球“共产主义扩张”方面的政治“威望”正是美国一步步滑入越南泥潭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即使常规空中打击失败,甚至地面进攻也是徒劳,在对抗有限的局面下,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依然不会有有多大改观。

## 道义及政治成本

核威慑的作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道义问题的困扰。在所遭到的冒犯远非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若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动用核武器,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这种行为将被广泛谴责为野蛮的,即便在西方社会也会引起舆论上的“核爆炸”。放弃有效的常规力量不用而诉诸核武器也足以构成一个广受抨击的道义问题。如果受到核攻击的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情况就更为糟糕。核问题的历史表明,道义因素令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似乎比对有核国使用核武器更不现实。如果使用核武器,西方国家应该说会以军事和工业目标为打击对象,它们想避免平民受到可怕杀伤引起的巨大麻烦。但是,即便不去关心核弹是否会打偏这个问题,核打击对平民、环境和邻近国家的“附带杀伤”也会相当严重。如果核攻击招致了严厉的报复,甚至是核报复,作出启用核武器的决定的领导人更可能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

如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还可能激化一直存在的对于西方的种族优越感的谴责。早在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就有人指责是种族主义使美国将核炸弹投到了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的头上。这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在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期间,美国有人建议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对此,艾森豪威尔言道:“你们这些家伙必定是疯了。我们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再次对亚洲人使用那些可怕的玩艺。”在核武器的使用所牵涉的道义问题中,基于种族问题的道义考虑一直是重要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个因素对西方更加重要。

---

见Larry Bem an, *Planning a Traged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Norton, New York, 1982

在冷战中,美国的公众舆论一直强烈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见Thomas W. Graham, “American Opinion on NATO,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Future Fission?” *CSIA Occasional Paper No. 4*,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1989

转引自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84 p. 184

在政治生活中,所付出的道义成本会化为政治成本。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道义上的麻烦会使西方在当前冲突中的行为“合法性”黯淡下去。如果受到核打击的非西方国家原先的所作所为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西方国家对其发出的要求还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道义上的解释或修饰,但核武器的使用可能反过来会使前者得到同情,而使后者的“底气”被削弱。如果核打击是为了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权改变反西方态度,核打击的非道义性很可能只会使其趋于增强。而且,假如该国的民众原先并不满意于其政府,核攻击也许会拉近他们和本国政府的距离,并使他们对西方十分反感甚至敌视。在使用核武器的西方国家内部,由于对于使用核武器的谴责或者由于核攻击招致了严厉报复而产生的对于政府的批判,有关领导人必然会面临很多政治失分甚至下台的结局。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长期性影响也可能出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也许将更为显眼,西方在国际社会的“声望”也许会遭到削弱,它在非西方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运作能力也许会受到更多的掣肘。

鉴于在对抗中所涉及的利益的规模,如此巨大的道义和政治成本显然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核威慑的可信性。在评论萨达姆据说因为美国的核威胁而不敢在海湾战争中动用生化武器时,凯思·佩恩写道,“萨达姆·侯赛因的决策看来未受美国领导人对‘核禁忌’的看重的影响——一个更加熟悉美国的政治文化的挑战者对此的利用也许会影响一场未来的地区危机。”

## 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安全利益

核武器的实际使用还会损害西方旨在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自身的威胁的努力。在冷战后时代,消除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被西方国家列为了安全政策的基本内容。1993年,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政府出台了第13号总统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13),它指出“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还是能将它们倾泻到几百英里之外的人民头上的弹道导弹——的扩散”是美国政府最紧迫的优先任务之一。美国或西方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关注基于它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冷战后的全球性干预主义政策使西方给自己制造了不少“敌人”,其中最令其介意的是哪些所谓“流氓”国家和许多和前者也许有着某些联系、在明处或暗处的“恐怖主义”组织。它们获得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作为它们的运载工具的弹道导弹的后果不能不令西方感到担心。消除核威胁又被列为了重中之重。“不友好”的非西方国家手中的核武器会让西方感到不安,若“恐怖主义”组织掌握核武器,西方更会提心吊胆。

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将严重损害它们的消除核威胁的努力。虽然自核武器问世以来,核国家从一个发展到了多个,但是,核扩散的规模还是受到了很大限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鉴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后果,核武器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少现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p. 140

W yn Q. Bowen, David H. Dunn, *American Security Policy in the 1990s: Beyond Containmen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Aldershot, 1996, p. 122 关于冷战后美国的不扩散政策,参见本书的第115—146页。

参见Richard K. Betts, “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77, 1998; Richard A. Falkenrath, “Confronting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rrorism”, *Survival*, 40, Autumn 1998; *Survival*, 40, Winter 1998(该期有一专门讨论)。



实使用可能的武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了动用核武器的事例,“核禁忌”观念可能受到冲击,在国家间冲突中,核武器也更有可能会得到使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在和西方核国家的对抗中,它们要更多地为对手手中的核武器所羁绊。尤其重要的是,若在并非生死攸关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这可能降低核武器可以使用的“门槛”,从而增加今后对手出于也非十分重要的利益而对自己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所以,在核武器未被实际使用的纪录已经保持了五十余年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所创造的危险先例反过来可能束缚它在和非西方的核国家打交道时的行动自由。

在核扩散问题上,若核武器的使用造成“核禁忌”的淡化和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的降低,这很可能促使更多的国家更多地考虑,是否有必要获得核军事能力以向他国施加压力,或者是用于抵御敌方对自己的核讹诈。假如西方国家对某个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这自然会大大增强感受到西方威胁的非西方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动机。并不和西方敌对的一些非西方国家也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核立场。和非西方的核国家毗邻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可能萌发发展核武器的想法,比如日本和若干东欧国家。美国对其西方盟国实行着传统的“延伸威慑”政策(extended deterrence),即承诺在后者遭到核袭击时以包括动用核武器在内的方式进行援助。迄今,这种安全保证对于使大多数西方国家不谋求核地位起到了相当作用。不过,美国能否履行核保证也一直被多少是一个问题。核冲突现实性的加大会使美国的盟国更多地顾虑美国履行其诺言的决心,而这也并不利于西方联盟内部的团结和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

在目前的国际核不扩散活动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主导者,美国也是对核扩散最为关心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无核国家(绝大多数是非西方国家)一直要求核国家实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会极大地削弱西方的核不扩散主张的影响力。如果受到核打击的是无核的非西方国家,西方的核不扩散政策就处于了更为尴尬的境地。因为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无核国家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所有核国家承诺不对承担了核不扩散义务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虽然迄今只有中国宣布了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其他四个核大国也已作出了下列承诺:不对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或参加了其他核不扩散安排的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和某个核国家结盟的无核国家对本国或其盟国发动武装攻击。后种情形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没有哪个非西方无核国家和核国家结盟。因此,西方对无核的非西方国家的核攻击就是对上述承诺的违反,不仅会加剧自己的道义困境,还将使核不扩散领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核攻击还可能刺激一些反西方的非西方国家对于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以弹道导弹为主的运载工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能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对它们来说,这些武器装备的获得能够增加自己对于西方国家的威慑力,有助于阻止后者对自己使用或再次使用核武器。

所以,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的利益不具有根本性的情形下,非常令人怀疑的是,西方国家是否会冒着增强西方所面临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危险而使用核武器。实际上,美国不少官方人士认为,在冷战后,美国应该大幅度“淡化(deemphasize)核武器在安全概念中

的地位,以促使他国也这样做。自然,这对在常规武器方面居于绝对优势、又积极推行全球干预政策的美国是有利的。

## 遭到报复的危险

使用核武器引发的遭致报复的危险对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报复可以是军事意义上的,也可表现为经济 and 外交制裁。鉴于当前西方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西方的依赖,即便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起核打击,它们也很难遭到严厉的非军事意义上的制裁。历史上,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发起的唯一一次具有制裁性质的严重经济打击就是当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的石油战,这令西方吃了很多苦头。可是,在今天,即便美国粗暴地对某个阿拉伯国家动用了核武器,阿拉伯产油国不可能对美国长期实施惩罚性的石油政策。石油是西方的血液,但石油美元更是产油国的血液。

就军事报复而言,如果面对的非西方国家没有值得一提的军事能力,西方国家核威慑的作用显然不会因为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而受到抑制,如同北约可以肆无忌惮地空袭南斯拉夫而不用担心后者会进行有效还击。如果核威慑所针对的非西方国家拥有较强的常规军事力量乃至生物或化学武器,西方国家的核打击自然可能招来有力的甚至可怕的报复,更不用说非西方国家拥有核武器。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除了俄罗斯等若干非西方国家,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西方的核威胁还是一个问题。

或许,更令西方感到惶恐的是,受到核攻击的非西方国家或者是它在非西方世界中的同情者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行动。在某个西方国家对某个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之后,它大概会要求国内民众防范可疑的人或举动;要求边防部门加强出入境管理;要求国外的使领馆、军事设施、各类办事处和企业机构等保持戒备状态;要求它的公民不要去事发地区旅行;要求本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加强安全检查;要求自己的盟国也加强戒备,等等。“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旨在防范其的一切会使当事国承受物质损失或精神紧张。然而,这点并不足以成为遏止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起核打击的因素。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一直存在着,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怎么改变对非西方世界的积极干预政策。而且,在冷战后时代,虽然西方对非西方的干预主义增强了,但似乎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规模较之以往还有减弱。在90年代,非西方势力对西方国家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只有早年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案和1998年的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的爆炸案。传统上,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大都和中东世界有缘。可是,如今,阿以矛盾趋于消解,巴勒斯坦人获得了自治地位。以前常被西方指责或怀疑为支持或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对西方国家也执行了实现缓和或是注重稳健的政策(典型的例子是在承受了十余年的国际制裁之后,利比亚终于交出了两名涉嫌洛克比空难的特工人员)。

尽管如此,当然不能否认,存在着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西方国家遭到严重报复的可能。若“恐怖主义”分子掌握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更会如坐针毡。

---

William Perry, Ashton Carter & John Steinbruner, *A New Concep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1992, pp. 11—12

如果这些报复有着相当的实现可能,和有关冲突中所涉及的利益的大小相比,启用核武器就更显得得不偿失。不过,即便如今西方国家可以相对放心地对非西方国家动用核武器,而不必那般担心遭到可怕的报复,它们的核威慑的作用也十分苍白,因为前几个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足以令西方国家的核威慑很不可信。

## 明确的或模糊的口头威慑与同盟政治

西方的核威慑的效力还和传达威慑信息的方式相关。的确,这种方式并非仅仅包括用语向对手表示自己必要时可能使用核武器。有时,单单是核武器的拥有本身就可以产生威慑力,这就是所谓的“存在性威慑”(existent deterrence)。可是,在冷战后时代,鉴于西方对非西方的核威慑的作用存在着上述严重问题,西方的核力量很难切实具有存在性威慑的意义。这样,假如西方要运用核威慑,就只能发出威慑语言。一个选择就是,明确地告诉对手,如果它胆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核惩罚。可是,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作用的极其有限依然会相当地妨碍明确的口头核威慑的效果,并使西方在威慑失败时不免有骑虎难下之尴尬。

而且,这种威慑的作用还会在另一种意义上遭到削弱。当前,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干涉时,西方国家常常采取集体行动,尤其在干涉的规模要求分担成本和显示西方阵营的团结一致的情形下。这样,同盟政治就产生了作用。在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假如美国打算明确发出非报复性的核威慑,它大概不能不事先和盟国充分交换意见。否则,美国可能陷入困境。如果美国在未和西方盟国通气的情况下擅自发出了明确的核威慑,这不仅会被视作对盟国的傲慢和不尊重,还可能令盟国政府处于某种尴尬境地,因为它们可能被国际或国内舆论谴责为和美国人就进行核冒险进行了密谋,或是没有从美国人那儿争取到足够的平等,让后者牵着鼻子走。这些都可能破坏西方世界的集体行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盟国领导人或其公众舆论对美国发出的核威慑持明显的异议(这是很可能的),从而使西方联盟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暴露在世人们面前,核威慑的作用自然更要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核威慑不能令对手屈服,面对着盟国方面的反对,为了维系和盟国的团结,保持西方世界在当前事态和日后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美国大概也只能让自己当初的威胁沦为吓唬人的空话,同时不得不接受“威信”的受损。这样,在西方的集体行动中,美国也许可以就是否发出明确的核威慑而事先和盟国商讨。但是,美国的西方盟国会赞同发出这样的核威慑么?它们会同意在威慑失败之后履行核打击么?这些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迟疑意味着时间上的拖延,这很可能使这一决策过程为公众所关注,进而引发广泛的反核舆论,而这又可能加剧作出积极的核决定的难度,从而会进一步削弱核威慑的作用。

因此,美国或西方会选择发出给自己留有余地的相对含糊的威慑语言,比如威胁说“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或者是“在必要时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西方可以对其对手威胁说,若不满足某某要求,几月几日几时就将发起空袭,但它们不可能发出如此明确的核威胁。在科索沃危机中,当谈及派遣地面作战部队进攻南斯拉夫时,北约就采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腔调。毕竟,地面进攻可能造成的巨大伤亡令他们不可能就地面进攻发出明确而坚定的威慑信号。可是,不坚定的威慑语言也只会让对手更多地看到自己心中的踌躇。

## 对付生物与化学武器?

上面已经表明,在冷战后时代,在和西方国家的对抗并不牵涉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背景下,对西方国家来说,对非西方国家的非报复性核打击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至少是很有限的。西方人士也意识到了这点。与此相联,一种占优势的观点是,核武器的实际用途只能是在敌方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报复。1992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就指出,核武器的用途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在遏止拥有核武器的敌手首先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确实有其功用,但是,西方国家旨在遏止生化武器及常规弹道导弹的使用的核威慑的可信性则需具体分析。有文章指出,如果一枚可播撒300公斤沙林毒剂的化学武器投掷在了象迈阿密、利雅得和特拉维夫这样的人口不那么稠密的城市,可能会令200至3000人死亡;一枚可播撒30公斤炭疽菌的生物武器落在同样的城市,死亡人数则可达到20000至80000。如果受攻击的是象开罗和德黑兰这样的人口更稠密的城市,死亡人数可能增大10倍!所以,如果非西方国家用生化武器攻击西方阵营国家的城市,并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也许西方国家的确会动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不过,如果受打击的是战场上的军队,西方国家进行核报复的可能是令人怀疑的。在当今时代,西方军队在战区的集结密度已远不如以前,而且还装备有一定的防范生化武器的用品,这使得生化武器的袭击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应是相对有限的,以至于进行核报复对西方国家而言可能是弊大于利,何况西方强大的常规军事能力仍然足以扮演报复角色,尽管它们已经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海湾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在战事开始前就排除了动用核武器以报复对生化武器的使用的可能。虽然美国也警告伊拉克,如果它使用生化武器,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报复,但布什为首的决策层私下也作出了即使遭到生化武器袭击也不动用核武器的决定。事后,美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扩大常规空袭的范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则表示,作为报复,美国可能轰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以水淹巴格达。当然,有研究认为,萨达姆确实十分害怕美国用核武器来报复他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不过,单是美国拒绝排除利用核武器来报复伊拉克的生化武器攻击的可能就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对于核武器的态度。事后,拉吉夫·甘地在给他人的信中写道,美国对核武器的使用将使印度“除了把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变为核实战能力外别无选择。”

## 结论

以上论述了冷战后西方国家的核威慑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的实际作用。其中表明,

转引自W. Thomas Wander & Eric H. Arnett, eds, *The Prolifer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Technology, Motivations, and Response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 245

Steve Fetter, "Ballistic Missiles and Weapons of Massive Destru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Summer 1991, p. 27.

Lawrence Freedman & Efraim Karsh, *The Gulf Conflict, 1990—1991*, London, Faber, 1993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注 43.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注 43, pp. 81—87.

转引自Wander, Arnett, *The Prolifer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p. 246

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所涉及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鉴于随使用核武器而来的道义和政治代价、报复的危险和增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等因素,西方国家动用核武器令自己得不偿失。西方拥有常规高技术武器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常规空中打击能力,这更使西方的核威慑十分不可信。在空中打击失效之余,西方也拥有其他的选择。在表达威慑信息的方式方面,西方也面临着困难局面。所以,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最多除了前者遭到生化武器袭击的情形,可以说,西方国家的非报复性威胁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有关的非西方国家基本上不会因为西方的核威慑而屈服于西方的意志,它们不为西方国家的核威慑——无论是以言语表达出来的还是“存在性”的——所左右。今天西方在地区性的危机和冲突中主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的确是极难想象的。实际上,在冷战后,除了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核威慑来警告萨达姆不要动用生化武器之外,西方并未口头发过核威慑。这表明,西方国家不仅认为核威慑将是不可信的,对核威慑的言语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都不能不在意。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圈子中,很多高级官员认为,只有作为对他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反应,美国使用核武器才是“合法”的。

自然,这些绝不意味着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干预主义的减弱或消失。当前,西方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成为了它对非西方地区进行干涉的一个主要的权力手段。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核力量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裁减,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根本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力量和核威慑政策,它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甚至改进自己的核力量。对西方而言,它尚需要利用核威慑,以阻止非西方国家进行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袭击,以遏制非西方核国家对自己首先动用核武器,并防范多少令其担心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的“大规模扩张”可能。而且,它还抱有这种带有侥幸的期望:虽然冷战后自己的核威慑的作用应该说是可怜之小,但说不定还是能够吓着非西方的一些“胆小鬼”。对美国来说,有效的美国核力量的存在对于继续美国的“延伸威慑”,避免西方或非西方的一些盟国成为核国家和维护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和政治轴心地位也必不可少。所以,西方将绝不会放弃核力量,它也尚未而且看来也不会轻易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和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另外,在象征意义上,核武器仍是西方核国家看作本身实力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国际威望的构成因素。如果英国和法国没有核武器,它们的世界大国色彩也许要淡化;对于美国而言,核超级大国身份也是围绕着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一道耀眼光环。而且,核力量的存在也关系到军事当局的部门利益和传统上和核军备建设紧密相关的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有人甚至认为,在美国关于军备规划的决策中,战略方面的真正考虑影响极小,而组织或部门利益方向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

Perry, Carter & Steinbruner, *A New Concep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Theo Farrell, *Weapons without a Cause: The Politics of Weapons Acqui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7.